

空间生产的城市问题及其治理

赵怡帆 文成伟¹

【摘要】：城市在借助空间生产实现空间扩容和发展的同时，其空间也在技术理性规约下出现了空间结构失衡、生态空间失衡和空间情感失衡等空间生产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空间的爆发与防控使得这些问题暴露得愈发明显。问题的产生并非完全源于技术自身，而是伴随着城市化与空间生产交织发展而出现的空间的商品化、空间的工具性改造以及空间技术化导致的时间异化等。因此，规避现代城市空间生产问题，需要超越技术依赖，实现由现代技术赋能向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的转变，从人本化治理理念、智慧化治理工具和精细化治理措施三个维度建构城市空间治理现代化路径。

【关键词】：城市空间失衡 空间生产 新冠疫情 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691（2021）04-0147-08

纵观城市化的进程，可以发现空间生产意义重大，其在技术创新与进步的支撑中，实现了城市规模和城市布局的革命性变化。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在近30年的时期内，大城市、超大规模城市增长加快，如北京、上海、广州，以及近期以深圳为中心的城市群。但是，随着空间生产持续驱动城市空间组织的生长，城市也在技术理性的摆置中出现了公共空间锐减、商品空间激增，人工环境扩张、生态环境破坏、剥离“体验式”情感、走向原子化生存等一系列空间生产失衡问题，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城市空间的爆发与防控使得这些问题暴露得愈发明显。为此，审视并规避现代空间生产的城市问题，对于推动中国城市化进程不可或缺。

一、技术理性规约下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失衡

空间生产“主要表现在历史性城市的扩张、社会的普遍都市化，空间结构问题等方面。”¹从这个意义上，空间生产是在城市化框架之下不断发展的，城市是空间生产的主体。在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语境下，空间生产关涉的是社会空间结构和空间系统的发展、变革，是满足中国当代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承载力提升等需求的空间解决方案。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以及技术人工物成为了空间生产的物质动因，构成了现代城市空间的物理载体，技术理性无处不在，它是现代城市运行的座架。它一方面带来了城市空间的高速生产，实现了城市人生存空间的改善、城市新文化空间的建构以及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城市空间结构失衡、生态空间失衡和空间情感失衡等现代空间生产问题。

（一）城市空间结构失衡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内部按照不同的空间功能形成的空间布局。而现代技术在城市空间结构形成中的运用，首先是基于“需求”，这种需求不仅源于城市化发展，也源于城市化带来的移民持续涌入以及城市中心人口的爆炸式增长。现代技术作为工具和物质基础，以技术理性对于“量”的效率追求来实现城市空间规模和容纳能力的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为了奠定城市化的空间基础，城市边界不断延伸、拓展，城市规模不断外扩，这些促使现代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持续打通城市交通网络，推动交通系统在城市空间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对于“定居”的需求，现代

¹作者简介：赵怡帆，女，大连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部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研究。

文成伟，女，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从事科学技术哲学、外国哲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后现象学技术哲学视角下当代技术与生活经验的关系问题研究”（项目号：19AZX006）的阶段性成果

建造技术和材料技术实现了大型的、高层的住宅建设，居住区在城市空间结构中完成了立体化扩张。可以说，技术理性通过计算、筹划所展现的效果和速度，为城市空间结构步入追求功能性空间生产的发展惯性提供了可能。但是，随着城市空间的普遍功能化，一些“功能性”不足的城市空间所面临的将是高效化的技术性改造和重建。如街道作为城市用于限制拥挤的典型公共空间，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让城市“流动”起来。面对日益拥堵的交通，城市人通过修建立交桥、高架桥、绕城高速、拓宽机动车干道等，对街道进行了功能化的技术性改造。功能性偏低的人行道、自行车道日益变窄，公交车专用道也多处于限时使用的状态。能够有效缓解交通拥堵的绿色出行在城市中反而变得举步维艰。街道中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建设比例的愈发悬殊，恰恰是城市公共空间日益“被功能化”的表征之一。此外，一些用于后备服务的公共空间，如休闲空间、储备空间、开放空间等在城市化发展的“需求”面前展现的恰是其缺乏功能属性的一面，它们逐渐成为城市空间结构中最容易被缩减或舍弃的部分。在技术理性所推崇的空间功能化过程中，多维度的城市空间功能反而向单向度发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缺乏使得集中救治中心、方舱医院等应急设施的空间选择极其受限，建造前的空间条件评估，与使用后的空间影响预判都难以完备。如武汉这样大量病例集中的城市，不得不通过空间转移的方式，紧急将博览中心、会展中心、体育馆等拥有较大空间的公共建筑改造成为临时的应急医疗场所。诚然，在已有的城市空间布局情况下，空间转移确为目前可采取的最为有效的替代性方案。从城市发展的维度考量，城市人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依然存在，提升城市空间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势在必行。这不仅需要破解当下城市空间结构的不平衡态势，构建能够应对如新冠肺炎疫情之类对城市造成严重威胁的突发性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的城市空间，而且应通过提升城市空间结构的多元性，强化空间韧性，以解决长期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潜在的、可能的灾害问题。

（二）城市生态空间失衡

城市的生态空间是指由于城市空间变化对于“生境”^①发展的介入，形成的城市和城市周边所特有的生态现状。由于技术具有一定的应用周期，技术理性的“创新”特性愈发鲜明，技术材料和技术人工物的不断推陈出新为城市向大城市乃至超大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庞大的资源支持。在现代技术的支撑下，由高分子材料、新型金属材料和复合型材料等人工技术物所构成的城市空间大规模地取代、侵占了自然空间。由此，城市和城市周边的生态因子和环境因子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适合生物栖息、繁衍和迁徙的生态系统难以为继，生物生存环境严重压缩。原本连续的自然空间被不断蔓延的城市空间割裂为多个碎片化的存在，边缘效应的增强使得自然空间生态功能下降。而城市虽然在技术理性的推动下逐渐成为一个巨大的技术人工系统，但是作为人生存的聚落，城市空间与城市人、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城市人与自然空间之间不可避免地进行着交互联系，城市仍然是一个在持续的新陈代谢中不断生长的有机体。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在城市空间、城市人与自然空间之间合理、适度、协调的交互关系上，达到三者之间的能量守恒。但是，随着城市空间、城市人对自然空间的“无节制”介入，自然生态系统对城市空间发展的承载力趋于极限，无法实现对城市生态系统的资源输入和有效调节，城市空间的有机性难以为继，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缺失。

城市生态空间失衡之下的“生境”破碎，首先，导致了城市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在技术人工物的强干预下，城市生态系统受到了冲击，城市生物多样性的基础被动摇，“稀释效应”^①被破坏。“与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相比，在生物多样性贫瘠的地区，病毒在单一物种间传播的机率更高。”^②换言之，生物多样性丰富地区的“稀释效应”可以有效抑制病毒的扩散，而生物多样性贫瘠地区，病毒的传播力度将被放大。其次，随着城市空间对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介入，使野生动物原生栖息地在割裂化和碎片化中不断缩减，人与野生动物相分割的自然缓冲区被破坏，“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在规划和基础设施薄弱的情况下，野生动物、牲畜和人类之间产生了新奇而多样的联系。与快速城市化相关的人类、牲畜、食品和贸易的加速流动，为包括人畜共患疾病在内的传染病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基础”^③。原本只存在于自然界，与野生动物宿主长期和平共存的病毒，在与人类的接触大幅度增长中，产生了其打破生物宿主屏障，从野生动物向人类传播的途径。最后，由于城市人口密集程度远远大于郊区、农村，城市人彼此的密集接触、呼吸废气、食物水源和生活垃圾都为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高致病性禽流感等新型病毒在城市中较高速度和较大规模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城市的生物安全体系因自身生态空间的失衡处于风险之中。

（三）城市空间情感失衡

城市空间情感是一种体验式情感，是城市空间通过外部的结构形态和内部的历史文脉，影响城市人的生活习惯、行为习惯和思维养成，进而形成不同程度的情感联结。在城市空间中，以亲缘关系为主的同质性个体间的“机械团结”和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多元个体间的“有机团结”并存其间。尤其是作为“家园”意义的城市空间，随着其人文性和历史性的积淀不断深厚，城市人之间的“共同体验”、城市人与城市空间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本应逐步递增，“有机团结”也应随之成为维系城市空间情感的主要力量。但是，现代技术推动下的空间生产，在某种程度上不断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重构着城市空间情感。从宏观维度看，技术理性下的城市空间生产，将城市空间设定为一个独立运行的技术人工物体系，赋之于上的现代化城市文明推动了城市新文化空间的形成。但是，城市空间从历史中传承而来的，由历代城市人的生产风貌、生活习俗和审美气质所凝结的历史文脉逐渐丧失了生命力，厚植城市人情感认同的文化存量被稀释。从微观维度看，供城市人生活的社区、居民小区乃至居民楼往往通过监控器、刷卡电梯、门禁卡等以隔离为手段的空间技术建构出相对封闭的单元化空间，技术在保护城市人生活安全性和私密性的同时，也诱发了情感隔离。宏观维度的历史割裂和微观维度的物理隔离都在或无形、或有形中阻断了城市人对于城市空间的“共同体验”，原子化的生存状态使得城市空间无法再成为城市人彼此认同的重要参照物，城市人和城市空间经由长时间的积淀所建立起来的持久的吸引力和归属感逐渐消失，城市人的“有机团结”被瓦解，现代技术以其理性成功制造出城市孤独和城市冷漠。

城市空间情感的失衡，使得城市人之间的情感联结愈发松散，以接纳、共情、包容为内核的“情感共同体”在城市中逐渐解体。尤其在突发性事件中，城市人之间的交往疏离和邻里生活缺失使得城市社群出现隔离，成为不同分散个体的原子式存在，情感认同的弱化使得瞒报自己或亲属在疫情高风险地区的居住史或旅居史的行为时有发生。但人们更应意识到，当城市空间在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中被按下“暂停键”，“居家隔离”“武汉封城”“区域风险等级划分”等措施从空间层面将城市人彻底“孤立”“封闭”成原子化个体的同时，也通过“空间隔离”有效阻隔了疫情的蔓延，是新冠疫情暴发期极为理性、适当的防控模式。但是，随着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阶段的到来，城市空间也需要复归到“流动”“开放”“交往”的常态，以实现城市空间生命力的复苏。而此时，支撑城市防疫系统运转的不仅仅是大数据健康码、电子测温器这些技术，更需要源自城市空间情感的内生动力。

二、引发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失衡的技术理性根源

城市空间不是单纯的物理或地理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动态过程，它与城市的居民、经济、政治等核心要素密切相关。因此，技术作为推动城市化的物质动因，在实现空间生产的进程中，技术理性规约下所引发的一系列失衡问题并非完全源于技术本身，其技术理性根源主要集中在空间商品化、空间的工具性改造和空间技术化导致的时间异化等方面。

（一）技术助推空间商品化

空间商品化是城市空间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作为投资对象被购买、重构、销售以实现其交换价值和经济效益的过程。随着人口、资源、政策在城市中的集聚，城市空间的价值不断攀升，面对其可能带来的高额利润，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将城市空间设定为可以投资、生产和交易的客体，而技术作为工具性的存在，通过空间生产来提升城市空间绝对的“量”和相对的“功能性”，进而使其成为商品，进入市场。由此，城市空间成为了“市场空间，流通路径空间，国家掌控的空间——一种完全量化的空间”^①。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房价的不断攀升成为城市空间商品化程度日益深化的重要表征。而在这一过程中，技术理性对“量”和“功能”的追求也被随之放大，“为了让其‘价值’更高，空间被人为的稀有化；它被片段化、碎片化了，以便整体地和部分地用来出售”^②。这意味着城市空间在技术理性和市场的共同塑造下倾向于均质化，其多样性逐渐被商业性取代，发展为易于确定交换价值、如流水线商品般的存在，“整个空间都成为生产性消费的客体，正像厂房、车间、机器、原材料和劳动力自身”^③，“城市的肌理，以及它的多种通讯和交换网络，成为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城市及其各种设施(港口、火车站等)则成为了资本的一部分”^④。

随着交换价值逐步取代了使用价值，城市空间完全进入了空间生产、空间流通、空间交换和空间消费的商品化过程。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城市通过面貌的更新改造、空间的无限扩展、各类资源的集聚和占有，追求财富和利润的最大化，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去公共性”的现象。尤其是经济效益和经济功能较为弱化的公共空间或被缩减，或被纳入商品市场进行公开售卖以作商用。而那些蕴含了潜在商业价值的城市公共空间，更是通过技术化改造被包装成商品。例如，一些汇聚城市记忆和城市文化的老街区，因己身具有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和稀缺性，使其具备了获取经济效益的隐含条件。由此，如北京南锣鼓巷、成都宽窄巷子、西安书院门街等一批由城市文化空间开发而来的商品空间应运而生。这其中当然不乏对于城市人文的商业化保护，但随着商品化程度的不断升级，原本的公共空间资源，逐渐从无偿和共享性的使用转变为有偿和专有性的使用，人本化关照淡化。城市空间作为城市人日常生活之地的性质和目的日渐被遗忘，原本属于城市人的日常生活空间被商品化的空间取代，城市的空间发展和空间结构日趋失衡。

（二）技术完成空间的工具性改造

城市空间作为被人类的技术实践活动改造的社会空间，已经成为人类技术实践的对象和成果。具体而言，技术实践作为人类最主要的工具性实践活动，将城市空间作为生产资料，通过精准的计算方法和逻辑运算，助推空间生产下的城市将自身预设为目标，并执着于生产自身。在这一过程中，空间被规划为一个连续的空间状态而形成“生产轨迹”，技术则按照预设目标对其发展进行调控。为了确保空间不偏离技术的谋算、控制，自然空间被降格为可被工具性改造的物化存在，“城内自然”被规划为“人工的”“符号化的”景观存在，“城外自然”被纳入城市，并改造为社会空间。城市空间则被打造成便于解构、重组、编码的空间材料模式，无论是城市自身还是包含于其空间内部的一切存在都倾向于标准化、规则化。但是，自然是自发的创造，不能进行生产，“自然并不劳动：它甚至是它所创造的定义性特征之一。自然所创造的每个生命都是艺术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它们属于某一个生物属或物种”^①。因此，自然不能按照技术的预设目标轨迹发展，人类带有明确工具性的技术实践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反自然的，“至少今天可以说，自然正在远离我们。想要逃避自然正被抽象、符号和图像、语言以及劳动和劳动产品等‘反自然’抹杀的概念是不可能的”^②。

伴随着与自发的、艺术的自然相悖的工具性实践——空间生产在城市的深刻发展，使城市的空间拓展在某种程度上对自然造成了不可逆的损害。人类对自然空间的过度开发，使得城市空间急速扩张，自然空间逐渐流失，“自然空间不可避免地消失。在这个空间里，积累的摇篮，富庶的地方，历史的主体，历史空间的中心——换言之，城市——爆发了”^③。以中国的沿海城市为例，随着城市空间资源的紧缺，依凭技术手段向海延伸，通过填海造城实现空间生产成为主导的发展趋势。完全人工化的海上城市，是对海洋空间工具性改造之下的产物，它们如同一座座人工孤岛，割裂了海洋空间的脉络。相较于人工海岸线，自然海岸线的比例日益递减，空间分布逐渐碎片化。以混凝土为主的技术人工物代替了原生态的砂石、滩涂和湿地，使得海洋生物难以生存，生物多样性的匮乏使得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多样性也随之被破坏，加之人工海岸线上集中修建的港口和建筑，其防灾功能随之降低。为此，中国于2017年印发了《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明确将自然岸线纳入海洋生态红线管控，要求到2020年全国自然岸线保有率不低于35%。

（三）空间技术化导致的时间异化

对城市和城市人而言，“空间是一种使用价值，但是与之密切相关的是时间，因为时间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基本使用价值”^④，二者在城市的历史维度实现了统一，其中时间是空间的历史来源，而空间是时间的历史映射。在二者的相互作用下，城市历史呈现出自身的发展节奏。但是，随着空间生产的实现，技术理性将自身推崇的量化的、规则的、重复的工具节奏覆盖叠加于城市历史节奏之上，将多元的、差异的、变化的城市历史节奏纳入技术化的运作中，作为城市人“共同体验”基础的城市历史，其延续与积淀于无形中，被技术理性所斩断和漠视，在城市人的感性体验中“时间在现代性的社会空间中失去了踪影。”^⑤此外，技术理性对于创新性和精准性的追求，使得其在空间生产的过程中，更倾向于规划、设计城市空间的“未来”，并推动空间生产按照既定的技术轨迹和技术方案，通过持续实现城市空间的“未来”塑造城市空间的“现在”。且技术理性的效率指向，将促使城市“以现在实现未来”的空间生产周期完全置于高速的技术节奏框架之下。某种意义上，城市空间将逐步

陷入追求“未来”、轻视“现在”、遗忘“历史”的发展趋势，城市的历史性时间出现了缺失。

随着技术节奏在城市空间生产过程中成为“领奏”，城市人被纳入了技术的时间结构中，并由此被动地陷入了技术性生存，其时间日渐被规约为具有同质性和配给性的“工作时刻表”，“除却工作时间，生命时间已经丧失了形式和社会利益”^⑥。被技术节奏度量的生命，使得城市人的生存状态被技术理性所形塑，日常生活中可供形成“有机团结”的、具有异质性的和独特个性的感性时间逐渐被机械的、标准的工具化时间取代，随着感性在技术节奏中的流失，城市人的情感陷入一种焦虑和抽象的情态当中，他们难以回归到自然主义和人文主义的状态，且在技术理性的统摄下，无法看到自身真正面临如知识、幸福、爱情等“感性”问题，而是陷入消费、生产等现代性问题中无法自拔。

三、规避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失衡的现代化治理路径

城市空间的技术化程度越高，对城市空间治理的现代化要求也越高。因此，通过建构现代化城市空间治理路径，规避现代城市空间生产失衡问题，需要实现由现代技术赋能向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提升的转变，实现空间生产、现代技术与地方治理能力的有效关联，从人本化治理理念、智慧化治理工具和精细化治理措施三个维度进行回应。其中，人本化治理理念是一种价值导向，需要借助智慧化的治理工具，以精细化的治理措施，打通城市现代化的治理路径。

（一）建构人本化的城市空间治理理念

城市空间治理不仅仅局限在城市的资源治理和环境治理等宏观层面，更是对城市中“天地人”融合域具体事务的治理，需要构建人本化的城市治理理念。“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合理安排生产、生活、生态空间，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努力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良好环境，让人民有更多获得感，为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①

首先，定位积极的城市人角色。空间商品化下城市公共服务空间的匮乏，终将导致城市部分空间共享价值的缺失。恢复城市空间的“公共性”和“共享性”，需要重新界定城市人作为城市主体在城市空间治理中的作用，赋予城市人以积极的角色定位，构建城市人与地方政府互为“合作伙伴”的城市空间治理共同体。从城市人的维度考量，积极的角色定位，体现了城市人参与城市空间治理的愿景。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城市人从地方政府服务下的被动获取者，转变为赋予城市空间以“公共性”和“共享性”的主动参与者。使城市人同时拥有治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进而以城市人全体共同利益的实现与发展为综合考量，规避城市空间的过度“市场化”和“经济化”。从地方政府的维度考量，积极的城市人角色定位，体现了地方政府在城市空间治理中对民间力量的诉求。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高效率、高弹性的运行模式和灵活性、回应性强的组织模式，以此规避权力集中、层级割裂的管理机制。引入市民参与机制，增强市民与地方政府对话交流、协同合作的能力，可以使城市人在复合型的治理模式中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城市空间。

其次，实现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空间作为一个综合性的技术人工系统，其运转不仅依凭城市空间内部的诸多子系统，更需要自然空间系统的支撑。在传统城市时期，自然空间决定了城市空间的兴衰，当自然资源枯竭、自然环境恶化，城市也便随之消亡。在现代城市时期，现代技术极大地提升了城市空间的“稳定性”，城市空间在所谓专业、高效的人造工程中看似越来越不被自然所制约，实则已将自身变成了各类技术人工物的堆砌。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的现代化，需要推动城市空间与自然空间形成“生命共同体”，即运用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了解自然系统，并运用自然力量与现代技术相结合，使其成为现代化城市空间治理体系中的核心动力，摒弃利用现代技术单向攫取自然资源为城市空间所用的粗放式发展模式，顺应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有效串联城市、自然，山水、人文，完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具体而言，一是要加强现有城市自然系统的修复能力，树立“海绵城市”的理念，使城市空间像海绵一样，在适应自然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韧性。二是要创建新的城市空间自然系统，如依托自然要素打通城乡绿色空间，建造兼具市民绿色出行和生物迁徙等功能的“城市空间绿道”。

最后，培育城市文化。城市文化是城市人的“情感家园”和“活的灵魂”，它不仅承载着城市空间历史变迁和历史事件的积累和沉淀，更通过或有形、或无形的形式将居住于该城市空间的居民极具地域特点的生产和生活风貌凝结起来。每个城市的文化都是这个城市空间所独有的，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与这个城市空间的情感依存，引导城市精神和城市气质的发展、变革。随着城市空间技术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空间系统和空间结构所呈现出的深刻变化，使得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和生存环境更加务实、高效，而优质的“人文感受”和“文化体验”则越来越成为城市人的美好向往。因此，城市空间治理不仅应为城市人创造便利的生存空间，更应培育生动的城市文化。换言之，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通过传承历史的文化载体、创新时尚的文化形式、拓展公共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城市空间对文化的滋养涵育作用，以保护城市空间的多元性，提升城市空间的魅力和品味。进而使一座城市能够充分表达生命力、吸引力、凝聚力和创造力，并以此影响城市人的情感选择，激发城市人对城市本身的热爱。

（二）建构智慧化的城市空间治理工具

在现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实现城市空间治理的现代化，离不开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高智能的技术工具。如果说智能还停留在物理化的硬件层面，那么智慧则包含了文化软因素的维度。因此，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不能单纯依赖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硬核技术——智能化工具，而是要建构价值理性与技术理性内在统一的，有温度、有情感，注重文化和人文体验的智慧化城市空间治理工具。

首先，实现从“局部智能”到“整体智慧”的价值升级。市场作用下，技术理性下城市空间的结构失衡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来部分空间在资源占用上的相对不平等。高智能技术在部分城市空间所引发的资源集聚效应，使得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出现了“局部智能”的中心化问题。过分集中化的空间治理系统使得城市人的大量诉求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采纳、反馈、处理，城市空间治理的延展性、开放性和可持续发展大打折扣。因此，现代化治理需要提升城市空间的“整体智慧”程度，即打破高智能治理工具的局部垄断，构建多中枢联动的交互式智慧型治理框架。身处其中的城市人与城市空间治理体系可以形成“实时的”“多触点”的交互，城市空间治理主体可以根据交互过程采集的“大数据”信息，对城市人的民生需求、生活方式和工作状态进行综合研判，进而形成及时的、人性化的智慧交通、智慧医疗、智慧能源等治理方案。

其次，实现从“路径依赖”到“理念共生”的价值变革。无论是过去的“数字城市”，还是当下的“智能城市”，城市空间对于现代技术产生了强烈的依赖性。技术成为一种“万能路径”，但技术理性往往关注“眼前问题”，使得城市的空间问题走出了“应激期”，却转入了缓慢的积累过程。这样的过程会给城市人一种问题已经解决的假象，但核心冲突和问题本质却被技术理性所遮蔽。目前，表征最为明显的当属空间生态问题，完全技术化的城市空间在为城市人提供了便捷生存的同时，城市机体也出现了“人工化”和“反自然”的倾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生态破坏积重难返。而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则通过建构智慧化的治理工具，打造城市大脑，使城市学会思考，摆脱对技术的“路径依赖”，实现与城市人的“理念共生”。城市脑的运行，不仅是高智能技术的创新，更是城市空间治理模式的创新，它对于空间问题和空间发展的预判，建立在城市人与城市认知能力、计算能力、传输能力、存储能力多维度交互、关联的基础之上的，是群体智能与技术智能“理念共生”的结果，使城市人和城市空间可以在冰冷的技术界面交互感知对方的温度与脉搏。

最后，实现从“标准化控制”到“个性化服务”的价值转向。以技术理性为主导的智能化技术工具，始终将城市空间视为一个巨大的技术人工物系统进行“标准化控制”，城市人的个体差异，尤其是空间情感在这一过程中被忽略，人适应系统成为城市空间规划的主流。现代化的城市空间治理需要跳出机械化的理性框架，构建以“个性化服务”为价值导向、以高智能技术为工具基础的智慧化治理工具。它需要依照城市人的行为模式、日常生活习惯、心理特点和个性化需求进行设计、架构，精确城市人的个体需求，进而通过 APP、云共享、小程序等微端的、多元的、移动的智慧化工具将城市空间中的各大系统无缝衔接在一起，快速应用于城市中的每个空间单位、每个城市人个体，形成以智慧化工具为基因的城市空间微治理，实现城市空间发展适应城市人需求的规划愿景。

（三）建构精细化的城市空间治理措施

技术理性引发的城市空间生产失衡，使得城市人多样化的生活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以现代化治理体系实现城市空间的多元化复归，需要通过建构精细化的城市空间治理措施，使城市空间由扩张型生产向内生型生产转变，“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城市精细化管理必须适应城市发展”^①。其中，精准化治理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细节化治理则是精细化治理的前提。

一方面，以精准化治理实现城市空间差异化。技术理性作用下的城市空间结构失衡，不仅体现在城市布局，更体现在政策、市场和技术共同作用下的城市治理中，由于城市空间对于功能性的追求，现代城市空间的治理方案也趋于功能化的一致。但是，治理对于城市而言并非方向性的总体空间规划，而是关系到各个层面、各个角度的“微空间”，哪怕是一个社区、一条街道。尤其是新冠疫情常态化防控下，城市空间内需要调整疫情防控分区分级，将风险分区划定至社区，治理措施精准到更小空间单元。同时，每个具体的空间在城市场域中，都需要保持自身的建筑风格和文化特征，“微空间”的多样性直接折射出一个城市的活力和生命力，更决定了一个城市区别于其他城市的气质属性。因此，当将“像绣花一样”的精细化治理措施应用于城市的空间层面时，更多地要强调的是“精准化”。精准化治理是实现精细化治理的基础，是解决现代城市中因治理方案一致化而引发的模糊治理、粗放治理等问题的有效措施。精准化治理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有效性，它可以通过对治理问题、治理目标的精准分析和研判，进而采取精准的政策和技术措施，以实现精准的治理效果。二是针对性，它可以聚焦多种类型、规模和属性的治理对象，即使“微小”也可以准确定位。对于城市空间而言，精准化的治理措施，可以准确地将每一个“微空间”确定为治理对象，并结合该空间的自然、技术和人文要素，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精准识别和诊断，并因地制宜地选择合理的专业化治理工具，以提高治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使空间治理目标既适应城市的整体发展趋势，也符合该空间的自然环境、文化历史和人们行为模式，确保实际治理效果可达到预期的治理目标。因此，借助精准化的治理可以突出和固化城市“微空间”的特色，实现空间规划、建设和更新的差异化，避免其陷入机械的空间结构模式当中。

另一方面，以细节化治理实现城市生活多元化。技术理性使城市人陷入了技术节奏，城市生活也随之呈现机械化。城市空间中承载多元化要素的“有机团结”在空间情感失衡下难以为继，合作型的城市社会结构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历史脉络和人文肌理遭到破坏。从中可以看到，作为人们高密度生存空间的城市是诸多迁移群体的聚集地，不同民族、性别、年龄阶层的人群组成了多元的城市人群体，他们为城市空间发展带来了多元的文化、建筑、经济形式和发展路径。城市生活的多元化不仅体现了城市空间对于城市人差异性的包容度，更是一座城市的粘合剂。因此，以细节化治理打破现代城市空间的机械化态势，重塑城市生活的多元化势在必行。细节化治理是精细化治理的前提，它更关注个体，重视局部，且尊重差异。治理主体和城市人作为城市治理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从治理主体的供给侧到需求侧，是一条目标明确的通路，许多细枝末节被忽视，而从城市人的需求侧到供给侧，则是从细枝末节中寻求服务。若供给侧不能实现细节化治理，城市人很难准确实现利益诉求，“在城市治理中，要推进服务供给精细化，找准服务群众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对接群众需求实施服务供给侧改革”^②。细节化治理主要从识别城市人的需求细节出发，明确不同城市群体的需求差异，应用合适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技术治理工具，因人制宜地提供精准服务，以提升城市空间治理对城市生活多元化的回应性和预见性。

综上所述，城市空间不是单纯的技术空间，空间生产也不是单纯的技术性实践活动。在政策、文化、经济等因素的作用下，城市空间生产作为人为的合目的性建构，技术在其中充当了工具性的辅助角色。技术不仅助推城市空间实现商品化，完成了空间的工具性改造，更因空间的技术化导致了时间异化。超越空间生产的城市问题，需要在考量上述技术理性根源的基础上，寻求一条综合性的现代化城市治理路径。即以人本化治理理念为价值导向，从积极的城市人角色定位出发，促进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培育生动的城市文化。并借助具有人文温度的智慧化治理工具，完成城市空间从“局部智能”到“整体智慧”、从“路径依赖”到“理念共生”、从“标准化控制”到“个性化服务”的转向，进而通过精准化和细节化的治理措施，实现城市空间差异化、城市生活多元化的复归。

注释：

1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2009, p. 186.

2 生物总是以特定的方式生活于某一生境之中,同时生物的各种行为、种群动态及群落结构都与其生境分不开,所以生境也可以说是指生物个体、种群或群落的组成成分能在其中完成生命过程的空间。一个特定物种的生境是指被该物种或种群所占有的资源(如食物、隐蔽物、水)、环境条件(温度、雨量、捕食及竞争者等)和使这个物种能够存活和繁殖的空间。(戚仁海:《生境破碎化对城市化地区生物多样性影响的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第6页。)

3 稀释效应是指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通过减少易感物种的数量来稀释传播事件的发生。参见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Zoonotic diseases and how to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2020. <https://www.unep.org/>.

4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Zoonotic diseases and how to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2020. <https://www.unep.org/>.

5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Preventing the Next Pandemic—Zoonotic diseases and how to break the chain of transmission*. 2020. <https://www.unep.org/>.

6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Blackwell Ltd., 1991, p. 352.

7[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页。

8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p. 347.

9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p. 187.

10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p. 70.

11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1991. pp. 70-71.

12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p. 187.

13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p. 191.

14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p. 191.

15 Lefebvre, H. *State, Space, World*. p. 191.

16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7413.htm。

17 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7lh/2017-03/05/c_1120571919.htm。

18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2019-11/03/c_1125187413.htm。